

# “书法大省”的品牌效应

本报记者 余英茂

今年5月,河南省书法家协会(以下简称书协)迎来了30周岁“生日”。如今说到河南,书法界人士就会联想到“书法大省”,就会谈到“中原书风”的影响和魅力。河南已成为全国公认的书法大省,涌现出众多书法名家,安阳、开封被命名为首批“中国书法名城”,偃师等5个县市被命名为“中国书法之乡”。“书法热”在我省长盛不衰,一手拿锄头,一手运毛笔,成了中原乡村随处可见的风景……

## 中国书法看河南

今年1月24日,第三届中国书法兰亭奖作品展在平顶山落幕。本届兰亭奖评选及作品展因参评作品数量空前,获奖作者普遍年轻且艺术探索特点明显,被认为“具有里程碑意义”。兰亭奖是中国书法艺术的最高专业奖,艺术奖是兰亭奖最重要的单项奖。本届兰亭奖艺术奖评选,我省创造了4个全国第一:我省参赛作品1141件,占全国总参赛量的1/5;评出的31个艺术奖,我省获得11个,占该奖项的1/3;全国入展作品450件,我省入展94件,占入展作品的1/5;我省的陈花容、郑庆伟同获兰亭奖艺术奖一等奖,我省的《书法导报》还获得编辑出版奖一等奖。

多年来,在中国书协举办的重大赛事中,我省的人展人数、获奖人数一直居全国前列,近百位书法家在各类专业展览中获奖。在首届兰亭奖评选中,河南有31人入展,夺得19个奖项。第二届兰亭奖评选出30个艺术奖,我省一举获得7个。兰亭奖共办了三年,我省每届都获得艺术奖一等奖,创下“三连冠”。

对此,省书协主席宋华平认为:“这再次印证了河南书法大省的地位。”中国书协主席张海指出:衡量一个省份是否称得上书法大省,主要是依据全国展览入选及获奖人数。这犹如衡量一个省是不是经济大省,需要有若干经济指标。若以入选数和获奖数衡量,河南在全国数届大展中的成绩都在前列,很自然地确立了书法大省的地位。河南当年的书法群体骨干,现在已相继进入60岁,第二代30至40岁的新人正迅速成长,已在全国崭露头角,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综合来看,河南在全国书法界不仅成绩突出,更重要的是实现了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河南书法的崛起可谓有目共睹:我省现有中国书协会员694人,省书协会员4500人,是全国书协会员最多的省份之一。在中国书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著名书法家、河南偃师人张海高票当选中国书协主席,成为中国书协历史上第一位由地方书协产生的主席。我省书协7位正、副主席还被推选为中国书协理事,“中原七剑”纵横书坛,使河南成为中国书协理事最多的省份。

有句顺口溜云:“河南一大怪,书法比画卖得快。”书法在河南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全省书法爱好者达200万人。在书法的许多分类领域,河南均有当今中国书坛的代表人物,如张海的隶书、小行草,王澄的魏体行书,李刚田的篆书、篆刻,王宝玺的篆隶、篆刻,周俊杰的隶书、书法理论,宋华平的行书等。

书坛有“中国书法看河南”之说。2006年6月,浙江书协副主席、著名书法理论家陈振濂在参加“中外书法家河南行”活动时表示,河南的团队力量和创作能力优于其他省,是以“集体面貌”取胜的成功范例,河南的书法领军省

## 书法成为河南的文化品牌

众所周知,国展代表了中国当代书法的最高水平,敢于承办中国书协主办的大型活动,是河南的一大亮点。

2009年被称作“中国书法河南年”,河南先后承办了5项由中国书协主办的全国性书法活动:在平顶山举行第三届中国书法兰亭奖评选及作品展,圆了河南人承办“兰亭书法展”的梦;在郑州举办了全国第八届书法理论研讨会;在中国文字博物馆成立之际,安阳举办了翰墨春秋——中国百位老书法家作品展;在开封召开了“中国书法名城、书法之乡联谊会成立大会”;在洛阳举办了全国第二届隶书艺术展及创作论坛。

河南为何争当全国大型书法活动的东道主?省书协主席宋华平坦言:“因为我们具备这个条件。我省对书法的普及与提高抓得好,各级领导非常重视书法事业,书法创作呈现人才辈出、百花齐放的现象。既然当了东道主,就要努力提高我省作者的水平,取得好成绩,对河南的书法作者也是锻炼和提高,可以发现人才,推进书法的繁荣和发展。”

在整体风格上,河南以雄强豪放为特征的书法在全国独树一帜,这种个性和特色十分鲜明的地方风格,被理论界推为“中原书风”。当今书坛以地域命名而得到书法家公认的,只有河南一家。

2006年2月15日,《书法报》刊发汪雷的署名文章《河南方阵的收藏价值与市场走势》,曰:河南首创中原书风,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几无间歇,一代又一代新人活跃在国家重要书法作品展上。据统计,两大展事获奖作者中,河南居全国之首,其气势除江苏等个别省份可与之勉强抗衡外,其余皆不能望其项背。近年来,日本和东南亚出现“王铎热”,许多国外友人正是通过学习我省明朝书法大家王铎的书法艺术,而了解、喜爱河南的。对此现象,张海先生认为:书法是中国最古老的艺术,在欧洲艺术家眼中,哪种艺术最能代表中国艺术?他们认为是书法,这说明书法艺术在国际上的地位。书法已成为河南十几个艺术门类中比较突出的一个,中原大地上绽放的绚丽夺目的书法艺术之花,已成为河南的文化品牌之一。

## “书法名城”闪耀中原

2008年5月7日,经中国书协严格审查,我省的安阳、开封两市被命名为首批“中国书法名城”。近年来,书法成为热门艺术,为奖掖对发展书法艺术有突出贡献的城市,推进书法艺术的传承与发展,中国书协决定在全国评选中国书法名城、书法之乡。虽然许多城市积极申报,但经过评选,中国书协只批准了苏州、徐州、开封、安阳4个城市为首批“中国书法名城”。

开封市之所以能够申报成功,在开封市文联副主席高树田看来,这是开封的书法地位和优势使然。开封的书法历史积淀丰厚,现存仓颉造字台、蔡邕故居、阮瞻啸台等书法遗迹400余处,各



河南书法家开创的“中原书风”享誉书坛

个朝代开封都有大家涌现,如东汉的蔡邕,北魏的郑道昭,唐代的孙过庭,元明清时期的周亮工、李梦阳、李鹤年等,特别是北宋的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四大家,还有独创“瘦金体”的宋徽宗赵佶,都是享誉中外的书法大家。命名书法名城,是对开封市书法地位和成就的肯定。

评审中国书法名城,不仅要考察该城市的书法历史贡献,还要看其在创新发展中如何。改革开放以来,开封的书法事业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在发展中繁荣,形成了“书法洋军”,在全国占有突出地位。高树田认为,与其他城市相比,开封有很多亮点:该市有中国书协会员121人,占我省数量的1/4还多,有省书协会员450人,书法会员队伍如此庞大,在全国都处于领先地位。开封书法家的整体水平高,在全国屡屡获奖,人称“获奖专业户”。第四届全国书法篆刻展,开封市入展作品19件,获得一、二、三等奖各一名,居全国地级城市之冠,入展作品等于当时10个省的总和还要多!开封的大型书法活动多,影响大,20多年来举办大型活动300多次。早在2003年,书法艺术就成为正规教材,走进该市课堂,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有书法课。河南大学的书法专业既有本科也有研究生,是全国最高端的书法教育。开封的社会书法教育也搞得很好,有各种书法培训班、师徒等形式,群众的书法素质较高。开封的《书法导报》已发展成为全国书法界最大的专业报刊,书法教育走向了全国前列。

行走在开封街头,各种书法培训的招牌不

时映入眼帘,众多古色古香的老字号牌匾吸引着记者驻足欣赏。开封的书法牌匾非常有名,多是知名书法家题写,有的字体遒劲刚健,有的清秀俊雅,有的飘逸洒脱,各具风采。

在浓厚的书法艺术氛围中,早在二十世纪80年代,开封书法已名扬在外,“书法热”至今不衰。1987年,开封举办的“现代国际临书大展”,有26个国家的书法家参加,征集作品两万余件,展出700余件,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成为具有标志性的重大书法活动。

开封人钟爱书画,有着庞大的收藏群体。书法爱好者刘先生告诉记者:“开封市民搬新家,不在家里挂几幅字画,就觉得没档次。”开封东京书画城、宋都御街、南京巷等书画经营场所都在2000平方米以上,年营业额近亿元,颇具规模。著名的“中华老字号”开封京古斋以经营开封名家字画闻名海内外,与北京荣宝斋等被誉为全国八大名斋。

1984年,开封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市级书协,成立之初,市政府就将书协驻会人员列入行政编制,之后又实行公务员待遇,有重大书法活动,市领导都积极参加。当地书协会员中,有厅级干部6人、县级干部20余人,这在全国也是少见的。

在我省的另一座中国书法名城安阳市,公园内、广场上,马路边经常可以看到年幼的学子或耄耋老翁提着水桶,拿着“大毛笔”蘸水在地上练习书法。

# 新闻时评

编辑 陈培营 杨怀锁 电话 67655282 E-mail: zxm@znews.com

## “三年大变样”让权力伦理走样

河北邯郸广平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然而,县里计划年内完成20多亿元的市政工程建设,并用10天完成33万多平方米的拆迁任务,使1000多户群众的房屋被拆,土地被征用。广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赵风河道出玄机:根本没有与住户签订拆迁、安置等协议。对于为什么被拆迁,一位居民说,“因为三年大变样,你拆也得拆,不拆也得拆”……(《京华时报》)

如果公共财政有了钱,有了能力进行大规模、系统性的城市建设,推进城市化进程——让城市“三年大变样”,没什么不可以的。毕竟,城市环境水平的大幅提升,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宽阔的马路、舒心宜人的公共场所,受益的是全体市民而不是政府。但问题是,按照广平县的规划,今年实施的“11168”工程如果全部完成,县里将投入20多亿元。而该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截至去年年初,全县仍有5万多人没有摆脱贫困,去年全县财政收入只有1.3亿元,这么一点财政收入刚刚能维持运转,请问20多亿元的建设资金从哪里来?

所以,不管从哪方面看,这更像是一种公权力推动主导的、大于快上、声势浩大的形象工程。很容易因规划发展的急功近利和后续资金的投入乏力,而不了了之,沦为轰动一时但却“赔害”于长远的“半拉子工程”。显而易见,公共之所以对“三年大变样”持忧虑反对态度,关键就在于此。大众担心这样轰轰烈烈地城市化建设会在推进过程中异化为贪大求洋、好大喜功的“政绩建筑”和“面子标志”,不但浪费大量无谓的财力物力,还会严重损害公共利益。

城市发展定目标本无可厚非。但不切实际的“三年大变样”却不是发展“目标”,而是一种满足权力虚荣的工具。“一年一大步,三年大变样”的口号听起来振奋人心,其实却是不折不扣的“大忽悠”,昭示着发展观的畸形和权力伦理的走样。正因为权力伦理的“走样”,才会无视法律规范和群众利益,在没有依法与居民签订拆迁协议的情况下,仅凭一纸拆迁通知就实施大规模拆迁。“仅用10天时间就拆除房屋33万多平方米,超额完成邯郸市下达的全年拆迁任务”——却不知将法律尊严和公共利益置于何地?

温家宝总理最近在答记者问时,说过这样一句发人深省的话让人记忆犹新:“正确的经济学同高尚的伦理学是不可分离的。”功利的“三年大变样”,违法的“大跃进拆迁”,极其低廉的拆迁补偿价格……如是种种,不能不说,这不具有“高尚的伦理学”。而既然权力伦理出现了问题,纵然“三年大变样”最终推行成功,这也并不是一种正确的经济发展模式。 陈一舟

## 40个教授为何要争当一个处长?

读《人才争夺打响“世界大战”》,我再次感受到在人才问题上中国吃的亏太大了:中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居世界首位。截至2008年,中国已派出近140万名留学生,而归国留学人员不到三成,滞留在海外的留学生超过百万。而美国《科学》杂志甚至把清华、北大称为“最肥沃的美国博士培养基地”。(《中国青年报》5月24日)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才滞留海外不愿回国?尽管作者在文章中并没有明说,但也透露一些信息:2008年2月,世界著名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毅然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辞职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出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院院长,在海内外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施一公说:“普林斯顿大学是美国最适合做研究的地方,从条件上讲,如果只从科研角度出发,我没有必要回清华,我回清华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做科研,我回来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育人。”

为什么国内不是最适合做研究的地方?老实说,这不是我所能完全说清楚的问题。但我知道一点,国内有一种不利于做研究的价值导向:一个人只有做了官,才是最出息的。一个学校编校史,总是将学校里出了哪个市长、哪个书记作为自己最值得炫耀的资本。搞校庆活动,县长要比教授专家坐上更重要的位置。在这种情况下,安心做学问搞研究的自然减少了,出现40个教授争一个处长位置的情形也就不足为怪了。

因此,要想在争夺人才的“世界大战”中不打败仗,那就必须将目前的这种做官第一的价值观颠倒过来。如果能做到,那就不会有40个教授争一个处长了,甚至会出现相反的情形,有40个处长去争一个教授的位子。有了爱做学问搞研究的氛围,愿意回国搞研究的人自然多了。 汪强

## 大学生为何容忍非法的“零月薪”

共青团北京市委、北京青年压力管理服务中心联合发布2010年大学生就业压力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在专科学历和本科学历人群中,接受零月薪的人数比例相对较高,分别为18.5%和20%,而去去年本科生接受零月薪的人数仅为1.2%。

仅仅一年时间,大学生接受零月薪的人数比例“突飞猛进”,一时之间,舆论哗然,而有关方面却对此表现出无限欣喜。比如,北京青年压力管理服务中心主任熊汉忠表态:“这充分说明大学生的求职心态比以往更灵活、现实。”这种求职心态的转变确实没有错,问题是,这样的转变必须与零月薪对接吗?从根本上讲,“零月薪”是一种违法的用工形式。大学生不是法官,他们应当完全清

## 何处找寻为官者的底线

做人得有底线,官员首先是人,自不能没有做人的底线。如果着眼于他们代表公权力的特殊身份,则公众对为官者的底线怀着高于一般民众的期待,也不能算过分。而从眼下几起事例来看,真让人不知道如今一些为官者的底线何在。

5月19日,甘肃兰州市发生了一件很不起眼的交通纠纷,只因当事的一方一再宣称“我是局长”,遂使这“杯水风波”名扬天下。这人倒也不是个伪局长,虽只是个区旅游局局长,却似乎很金贵、很管用。在这名局长心中,想必是把“局长”这头衔当做护身符的,遭到纠纷,自然是“局长”比平民有理;处置纠纷,当然又是“局长”比百姓优先。但这样的逻辑和意识,若加以扩展,人世间就成了弱肉强食的动物界,既无道理可讲,更无法言可辩。驾于平民之上的“局长”终究也不过是一个“局长”而已。

近日媒体颇为关注的另一件事,是河北邯郸市一起强奸案询问笔录被四处张贴。你道强奸者是谁?原来是该市的一名镇党委书记。一级组织的主要领导,竟然犯下强奸的罪行,为官的底线安在?询问笔录泄露,进而导致被张贴,无疑是给受害人再次重创。笔录是谁泄露的?为什么会泄露?难道执法人员竟然认为,受害人浸透血泪的隐私可以广而告之,不妨作为公众的谈资吗?至此,在这一事件中,人们再一次领悟了公职人员的行事底线。

邯郸市有关部门已正式回应,表示对此事“高度重视”,已“组成联合调查组”,一经查实,将对相关责任人实施“严肃处理,绝不姑息”。个别官员失其底线,劣马虽少也足以害群,则负责任的组织应当对底线加以捍卫。此前,那个镇党委书记已受法律制裁,被捍卫的自然是作为公民的底线,但也可勉强地说是为官者的底线。

那个把“我是局长”当金身招牌的局长,不知会有怎样的命运?其人其事虽不及邯郸之事恶劣,但我以为捍卫为官者的底线,转机或在此中。执政党和政府形象的恶化,官民冲突趋于尖锐频繁,很多时候不是由惊天动地的大事件造成,恰是由类似小事未能善后累积而成。因为有什么样的“官吏”,就会有有什么样的“民间”。在自上而下讲求法治和道德的年代,有的官员不要说行为范、为人表率,相反醉心人治,蔑视人权,不惮于破坏公序良俗,不仅摧毁了为官者的底线,而且也拉低了全社会的底线水平。

对为官者底线的权威评价,应当来自公众舆论。官员若无底线,即无资格谈社会底线。自然科学中有一个“能量守恒”,不知这一定律是否适用于社会,但从一个家庭、一个单位来观察,似乎是可行的。也即是说,人们有冤不得伸,有气不得出,这能量并不会自行消失,它们会积聚起来,并且很可能转化,而最终会找到一个自我释放的突破口。而为官者底线大面失守,则意味着不间断地激发社会成员制造消极能量,使社会日益趋近全面溃败的前夜。虽则离此绝境尚远,但对为官者底线现状及其腐蚀社会的力量,却不可轻视低估,更不能放任宽纵。 滕朝阳

熊海洋/图